

# 引言：“一个人穿着一双小了两号的鞋子”

## —— 中国人口的现状

“繁衍吧，生息吧！充满大地。”这句古老的古希腊格言在几千年后却把人们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的人口发展是如此迅速，使得“人口爆炸”的理论风靡一时，人们开始唱起反对无限制繁衍生息的论调，而且对现实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那就是地球是否能承载日益增长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资源能否足以供给如此多的人口的消费。

1992年5月15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世界人口白皮书”说，现在全世界人口总数为53.8亿，人口增长速度为每秒4人，每日30多万人。今后10年计划每年增加0.9—1亿，至2000年全世界人口将达62.5亿，至21世纪末将突破102亿。

这是一组十分惊人的数字。正如80年代初威廉·福格特在他的一本名叫《生存之路》的书中所说的：“目前人类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穿着一双小了两号的鞋子。”

是呀，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以及过度消耗和浪费等事态已引起人均

耕地的减少、淡水供给紧张、森林破坏严重，生物物种锐减，环境污染席卷的范围越来越大等严重后果。

几年前看过一个笑话：幼儿园里老师给孩子们讲现在地球上人太多了，以后人们不得不去月球上生活。这时一个小女孩笑了起来。老师问她笑什么，她一脸的天真无邪：“我想如果月亮变成了月牙儿，那上面的人岂不是要摔下来了？”

如今人们进入月球生活的幻想的实现看来是遥遥无期了，而地球上的人口仍在按部就班地繁衍着。这使人不禁想到是否会在某个时间里，由于人口的增多而引起的地球的“变小”，会把人们“摔”了下去？

中国目前也正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已达 11.6 亿，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世界上人口在 5000 万以上的国家被称为人口大国，而我国有 5000 万以上人口的省就有 9 个：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广东、湖南、河北、安徽、湖北。而今第四次人口普查后又过了五年，中国的人口早已突破了 12 亿大关。传统的国情教育中“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使多少人为之自豪和骄傲，而今天人口问题却成了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并且人口的过度增长引起了连锁反应：人们所能占据的空间越来越拥挤，耕地每天都遭到“蚕食”，尘世日益喧嚣，污染愈加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数量已不再是中国的骄傲，而是成为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人口现状同世界一样，也如同“一个人穿着一双小了两号的鞋子”。

中国的人口数量仅从建国以来的 40 多年的发展来看，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人满为患”。1949 年到 1979 年，是我国历

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30年间共出生6亿多人，除去死亡人数，净增人口4亿3千多万，平均每年出生两千多万，净增人口1430万，每分钟出生38人，净增27人。这段时期除60年代初以外，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了20%，最高的近30%。这样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五十年代开始，社会出现了稳定局面，政府鼓励生育，对多子女家庭实行救济补助，生育子女多的妇女被当作“光荣妈妈”。人口的增长不仅被当作一个地方的伟大成就，也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例证。大跃进的神话更使人们相信，人口越多建设速度越快，成就越大，“人多力量大”是当时随处可见、随处可闻的标语、口号。人口的压力对当时的大多数人，甚至是专家学者来说，都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当毛泽东主席终于意识到要采取节育措施时，已经为时太晚，庞大的人口惯性已经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了。

从1973年以来，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由“一对夫妇一对娃”到“一对夫妇一个娃”，人口的增长率逐年下降，八十年代大致稳定在15%左右。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的人口仍有一千多万。今后几十年内我国仍处于人口生育高峰期，育龄妇女逐年增多。1988年有育龄妇女3亿人，2000年可能达到3—4亿人。在2010—2020年之间又将会有一个新的生育高峰。因此未来的几十多年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人口普查的结果与实际的人口数有着不可弥补的误差，单单是技术上的误差是很小的，主要的

是各种政策或具体制度对户口登记和调查带来的不良影响。例如为了显示计划生育的成绩，一些单位或部门故意少报、漏报人口；家庭或个人出于某种目的而隐瞒户口或年龄，例如为了生二胎，有些人千方百计地隐瞒已出生的人口，或者加入“超生游击队”中到处“打游击”，这就造就了大批的“黑孩子”。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使“民工潮”大量涌现，这样，每年的流动人口在几十万以上。这些情况带来的误差比人口普查的技术误差要大得多。中国的户籍登记和管理虽然在世界上也称得上严格有效，但却不能够得出更为精确的人口数字。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 12 亿的基数来说，任何微小的百分比都是一个不小的绝对数。在目前的体制下，行政单位或政府部门的弄虚作假比个人这样做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必然影响这些单位人口普查的准确性。

人口的迅速增长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 1952 年到 1988 年的 37 年，我国国民收入虽然增长了 10 倍，但人均收入仅增加了 4.8 倍；粮食总产量虽然翻了一番，但人均占有量仅提高了 26%。人均占有粮食量在 1984 年为 394 公斤，到 1988 年下降为 362 公斤。自然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低于世界水平，人均耕地也由建国初的 2.8 亩下降到 1.3 亩。

人口压力的形成是千百年来人口数量增长、积累的必然结果，是有着历史根源的。那么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状况是如何呢？中国众多的人口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成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压力是如何开始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分布的？又是怎样迁移的？历史

上各个王朝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怎样的？官方记载的户口数是否就是当时的实际数目？……

这些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课题，但是对十几亿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必须了解的常识——不管他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因为这关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了解这些，怎么可能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呢？正如五十年代经济学家马寅初与毛泽东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人口的争论，这场争论以一边倒而告终，其原因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还在于官方及学术界普遍对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并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不知道中国的人口压力已迫在眉睫，以致于在人口政策上政府没有把握好方向，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世纪的风挟着世纪的雨，流动在飞快旋转的时空里。还有四五年人类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纪了。过去岁月里的几千年中，或许有隆隆的枪炮声至今仍回荡在耳畔，或许繁华的旧梦醒来后枕边残泪未干；旧的创伤和新的欢颜人们都不应忘记，但是更应面对的还是未来。

要面对未来社会中人口发展带来的可能后果，人们仍需回顾历史。关于历史，人们了解的更多的可能是汉宫的荧荧秋月，长生殿上的夜半私语；可能是隔绝“胡”汉的万里长城，朔漠轮台的八月飞雪；可能是甲午的战火风云，辛丑的耻辱条约……但是对于人自身，对于这个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中最活跃的主体、对于这个主体的发展的历史却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就是旨在通过浅显易懂的手法，让广大民众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从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

的责任，那就是，即使是作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微乎其微的一分子、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都应该自觉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服务，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个人口政策的宣传口号，粉刷在墙壁上的标语。

在编写过程中，笔者主要参考了恩师葛剑雄先生的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恩师鼓励我把他的这部著作诠释成非纯理论的、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普及性读物，为此，在编写的自始至终，葛先生都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和悉心的指导，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 一、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河

## ——中国人口的发展

一定数量的人才能成为人口，人口数量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并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它集中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条件、从事物质生产、通过一定的社会结构实行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一般说来，凡是人口持续、稳定增长的时期，都是自然灾害较少、生产发展迅速、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反之，人口大幅度下降无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引起生产停顿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

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境内的人口数量是难以做出精确的估计的，但考古工作的开展进行给我们提供了赖以推测的依据，据此可以大致看出人类活动的范围、人口的分布状况。

考古发掘证明，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是云南省元谋县的“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和安徽和县发现的猿人化石也有五六十万年的历史。距今四五千年或更早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更是屡见

不鲜。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北至黑龙江省呼玛县，南至海南省的三亚市，东起黑龙江省抚远，西至新疆喀什的范围内都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遗迹。这说明早在 170 万年前中国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的活动。到几十万年前原始人的足迹已达到了很多地方，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众多的人类群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口相对稠密、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在大约一百万年到几万年前，我国南北各地的气候都比现在要温暖湿润，这为我国古老的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那时候，原始植被广布，森林葱郁，草木茂盛，河流交错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其他生物一样遵循着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缓慢地进化着。为了防御凶猛野兽的袭击，原始人往往采用群居的方式，过着共同狩猎、采集的生活。而由于抵抗饥饿疾病等外在压力的力量有限，原始人的寿命基本上都很短。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数量上有了发展，但是却无法了解得更深入。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分析现存某些遗址的规模、密度、残留的骨骼和器物的数量以及其它有关的实物对原始社会的某一群人作些数量上的推测，但是在缺少最基本的数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出稍为精细的、令人信服的答案的，而且实际上，即便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保留下最早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

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被人们当作敬业精神的典范而津津乐道，后世的史家都把传说中的人物禹歌颂为“圣王”，而《帝王世纪》中

的有关夏禹时代的人口数字也被许多学者们不加分析地利用，甚至沿用到今天。由于受一种事事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心理的驱使，《帝王世纪》中的人口数字被说成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一”。但实际上其可信度却值得人们怀疑。

首先，《帝王世纪》的作者是西晋的皇甫谧，《晋书》卷51《皇甫谧传》说他年轻时不好学习，终日游荡无度，以后才开始读些书，但是家里很贫穷，他不得不亲自从事农业耕作。他的《帝王世纪》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其参考书主要是他从晋武帝那里借来的一车书。但是，当时皇室藏书因战乱而所剩无几，皇甫谧所能看到的岂是秘籍珍本？更何况他并没有能够遍览皇室藏书，他能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次，从《帝王世纪》中的这段文字本身来看，也有着无法弥补的漏洞。夏朝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也只是战国时代学者们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并非真正的夏禹时的行政区划，不代表夏禹时的实际情况。就数字而言，人口的发展从夏禹到西汉元始二年有了增加，但垦田数却反而减少，这从情理上无法解释得通，因为西汉的疆域比起传说中的“九州”大得多，怎么可能耕地面积反而减少呢？《帝王世纪》中的人口数字不见于《史记》，也不见于《汉书》，皇甫谧以前的正史和其它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却凭空出现在西晋的史籍中，而且数字之精确令人咋舌，由此可见《帝王世纪》中的数字并没有什么史料价值。

商朝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奴隶制国家。在甲骨文记载

中可以看到商朝留下的数字是“三万”，卜辞中征兵一二万的记录不止一次。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商代人口调查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推测，商代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人口调查制度，因为商朝拥有完整的国家机器，商王和其他奴隶主贵族要进行军事征战、征收贡赋、占有及分配俘虏和奴隶、追查逃亡及杀人殉葬，都不能不借助于人口的登记和统计。商朝的统治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东北到辽宁，南及长江的广大区域。在商王直接统治区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方国，他们要向商王纳贡，并率兵随商王出征，并且方国也依照王室建立政权机构，组织军队、设置监狱，管理方国内的人民。因此可以说，商朝时的人口登记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完善而系统的。

周原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方国，公刘时期，因人口日多，由邠迁至豳（今陕西旬邑县西南），为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早在文王“治岐”之时，为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还制订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周灭商后，经过几代经营，疆域进一步扩大，北至燕辽，东至海，西至甘陇，南过江淮，范围空前广大。前 841 年国人暴动以后实行共和行政。周宣王时内修政事，“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改变了周厉王时的暴政；同时，“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史称“宣王中兴”。宣王时由于少数部族獫狁经常骚扰周境，《诗经·小雅·采薇》中描写道：“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起居，獫狁之故”“岂不日戒，獫狁孔棘”，为此，周王室发动了对獫狁的大规模反击，并且对南方和东南的荆蛮、淮夷、徐戎大举用兵，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周朝也大伤元气，人力损失很大。

宣王晚年在与姜戎的战争中失败，丧尽“南国之师”，因此，宣王实行“料民于太原”，就是在太原进行人口调查。这条史料见于《国语·周语》，其中还记载到在此之前的人口调查就已存在，但采取的不是“料民”的方式，而是由不同的官员分别负责登记所管辖的各类人口，对大部分奴隶不作直接调查，而是根据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及消耗的粮食来估算。根据这条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西周时的人口是根据不同的身分分别登记的，而且这种分类相当严格。《国语·周语》中的这条记载是最早的关于人口调查制度的史料，但是西周的人口数量却并未因此留下任何记载。

战国时代的人口数同样缺乏直接的记载，研究者只能根据史籍中提到的各国兵力或战争规模来推算。在战国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某某国家“积粟如丘，甲兵十万”，“带甲之士二十万”这一类的说法和战争中动辄死伤几十万的记录，其中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著名的长平之战，号称“坑杀兵士四十万”，这样的数字其实都不乏夸大的成分，因为游说之士要劝说当权者采纳他的主张，就需要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需要鼓动起他的如簧巧舌；战胜的一方为了夸耀文治武功，也往往虚报对方伤亡的数字。而这些却给后世的研究造成了麻烦。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各国为了增强作战实力，为了保证及兵力的来源、后方的军需，都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如齐桓公时任用管仲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所谓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士农工商各有所居，各安其业，既便于管理，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 and 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五家为一轨，每轨五人。十

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每军万人，全国共三军。通过这两项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的人口登记已经非常完善，这种制度不仅服务于社会生产，对军事行动也很有利。

各国在争霸中，把发展人口当作一项大事来抓。大家都熟知的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鼓励百姓生育繁衍并采取了奖惩的措施。《国语·越语》记载，勾践下令，壮年的男子不许娶年长的妇人，老年男子不许娶青壮女子。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妻，其父母都以罪论处，对将要分娩的孕妇，政府派医生守候身边。生男孩，赐给两壶酒，一只狗；生女孩，赐给两壶酒一只猪。一胎生三子者，政府给他们配派乳母；生双胞胎者，政府给予粮食。就这样，经过多年的积蓄力量，越国的人口有了增长，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兵力，最终打败吴王夫差，成为江南的霸主。但是也应该看到，各诸侯国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采取的鼓励生育的措施带来的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在血腥的战斗中损失殆尽，无数将士们的尸骨层层堆积叠累，成为各国诸侯争霸夺权的基石。

研究表明，战国时期的人口高峰是在中期，因为更大规模的斗争是在后面，是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这一系列的战争使得人口的总数大大下降。但是对战国中期的人口数究竟估计有多少，历来尚未达成一致，最集中的意见是在 2000—3000 万之间。由于作为推算之数字本来就不精确，估计时的随意性也很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不过从以后的数字推断，这些估计都是偏低的。

战国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主要是“上计”，就是由下级行

政长官向上级或国君定期报告有关统计数字及情况的制度。上计是以县为单位的，并都由县令亲自向国君报告，国君或由丞相协助进行考核。上计基本上是一年一度，户口多少是一项主要内容，国君以此确定县令的政绩。上计并不是以人口数量为唯一内容的专门的人口调查制度，但人口调查却因上计的实行而得以经常化、制度化。

“六王毕 四海一”，公元 221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建立了。野心勃勃的嬴政把经过多年征战奠定的这份基业视作他的私产，希望王位永固，传至子孙万代，因此他自号曰：“始皇帝”。

秦朝建立前后，全国的人口损失惨重。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统一后的第二年，他就在渭水南岸修建信宫和甘泉前殿。公元前 212 年，又在渭南建阿房宫，宫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工程宏丽浩大，“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为修建阿房宫，长满树木的蜀山被砍伐成秃顶。当时修建的离宫别馆达 700 余所，遍布函谷关内外及渭水南北两岸。秦始皇不仅生前极尽奢华之能事，而且还为其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在未统一之前，他就在骊山北麓修建陵墓。骊山陵墓高 50 余丈，周围 5 里多，内筑各式宫殿，陈列着各色珍宝，用明珠作日月星辰，用水银作成江湖海。

在秦朝统治的短短十余年间，秦始皇除征调大批人力造宫殿、修陵墓外，还动用大量丁役筑长城、征匈奴、戍岭南，并且北逐匈奴后又对“新秦中”（收复的河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每次动用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多，出现了“丁

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这些举措，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直接死亡，而且由于各地百姓要轮流服役，大量的人力还要耗费在路上，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减少了可供食粮。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秦朝时全国人口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低。

关于秦代的人口数量，同样也没有可靠的史料可以作为依据。但是首先能够明确一点的是秦朝的疆域比战国时期要广，增加了河套地区、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和岭南。前两者原居住人口较少，为此秦始皇采取“实边”政策；后者人口数量应当不少，因为秦始皇征服南越动用了四五十万兵力以及大量的妇女，由此可见当地的原有人口至少也有这么多。另外，在新设置的一些郡县中，也不可能进行户口登记。秦时的郡县人口数量不等，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境）是一个处于交通干线的普通县，秦始皇一次迁入的移民有五万户。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南）并非是政治或经济的中心，在秦朝时也有三万户。秦朝的县大约是两汉末的  $1/2$  或  $2/3$  从秦末到汉初，连年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必定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但是达到西汉时的一半以上还是有可能的。因此可以估计，秦朝时全国的人口达到了 3000 万以上。

秦的户籍登记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秦国早在献公十年（前 375 年）就实行“为户籍相伍”，即以户籍编组百姓。到了商鞅变法时，户籍制度更为严密。变法中有一项是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规定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否则“倍其赋”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为了防范不法之事又规定了连坐制度，规定五家为保，十保相连，相互连坐。由

于这些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秦国的户口登记是包括人口的性别、年龄等内容的、不分男女都要进行统计。秦灭六国以后实行郡县制，郡县当然要将所辖人口按时上报。至迟在昭王时已以郡为上计单位，将计书上报国君，而且上计已由专职官吏负责而不再由郡守亲自执行了。

对于西汉初期的人口，以往的估计都偏低，大家几乎都沿用了 600 万的说法。葛剑雄先生在其《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利用缜密而科学的推理，爬梳排比大量的史料，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否定了前人的成说，填补了人口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对于西汉初和其他阶段的人口数的推算，葛先生是以西汉末年的户口数为依据的。众所周知，西汉时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末年的一个全国户口总数的分政区的统计数，而且还有一些不同阶段、不同政区的户口数，而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户口数是公认的最接近实际的数字之一，这就为推算不同阶段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增长率提供了条件，并且还可以参考其它的数字，如兵力、劳力、粮食产量等对西汉的人口数量作一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推测。

西汉初年分封了一些侯国并以这些侯国土地上的百姓的租税作为功臣贵族的俸禄，叫做“食邑”。在百余年间，这些侯国先后被废，但是有 23 个侯国留下了始封和被废时的户数。这些侯国所在的地区原来经济大都较为发达，虽经秦末汉初战乱的破坏，但仍然是经济重心所在，因而人口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 13.5% 左右，而西汉初至武帝初的全国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0—12%。西汉时各地区人口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属京畿重地，吸

引了大量的移民，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长安城周围的三辅及邻近地区；有的地方因为地广人稀，开发余地尚大而有容纳接受移民的条件；有的地方却因开发较早，土地的开垦趋於饱和，人口也不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还有些地区因本来开发程度就低，再加上天灾和战乱等不利因素，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的增长。

但是西汉初年较为宽松的政治措施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对生产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终于造就了一个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局面，史书称赞这一时期“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无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俨然一幅清平之世的图景。在这种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得以迅速地增长。从汉初到武帝初（前 202—前 134 年）是人口的高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 10—12%。至该阶段末的元光元年（前 134 年），总人口约为 3600 万。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统治之初招抚流亡，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并且连续几代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所以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各王国的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如吴王刘濞曾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武帝中后期（公元前 133—前 87 年）是停滞、减少的年份，多年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该阶段末的武帝后元二年，总人口降至约 3200 万。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连续多年的对外征战、开广三边、招民屯田，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并激起了民愤，再加上天灾

严重，社会上出现了动荡的征兆，以至于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才暂时缓和了紧张的局势。这一时期还由于户口登记中开始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所以有些史书中有武帝时“户口减半”的令人惊奇的记载。昭帝初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 86 年—公元 2 年），人口数量出现回升，年平均增长率约 7‰，这一阶段又以宣帝地节元年（前 67 年）为界，前期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增长很快，增长率高达 12‰，总人口达到约 4000 万，“昭宣中兴”确实对人口发展有很大意义。此后汉王朝开始走上穷途末路，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开始减慢，略低于 6‰，但是到元始 2 年还是达到了 6000 万这个历史最高水平。

在西汉的正式辖区之外，还有广大的西域都护府，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辖区约有 126 万人口，其中在今天中国境内约有五六十万。这一数字是古代西域唯一的分地区人口统计数。在蒙古高原上还活跃着古老的匈奴族，《史记》、《汉书》的《匈奴传》中都提到秦末汉初时匈奴部落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项数字可能偏高，因而匈奴族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其它地区如青藏高原、东北辽河流域以外、西南和南方的边远地区人口数量就更少了。

西汉的户口登记与秦代是一脉相承的。刘邦的军队初入咸阳时，在胜利的欢乐潮中，将士们有的去掠夺金银财宝，有的去搜求美女娇娃，只有萧何把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文件接收过来，从而掌握了全国的战略要地、户口、土地等情况。但是汉的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又有了变化，对人口调查的措施也更加严密。上计的基本单位是县以及与县同级的邑、道、侯国。每年八月，首先由县令或县长根据原有户籍进行案比